

主持人语

近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再次因病辞职引发国际关注。作为一个强势领导人，这一举动在各个领域将会为日本留下什么样的遗产，成为大多数日本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尽管新首相菅义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内阁官房长官，但由于他是平民出身，且政治能力亦非十分突出，因此，新政府将会多大程度上继承安倍政权时期的政策，在当前中日关系处在非常微妙时刻时又将采取怎样的对华外交政策等一系列问题，都成为此次工作坊的讨论重点。

与会者认为，安倍执政时期形成的强势领导人制度设计未必适合后任首相。因而在后安倍时代，自民党“派系政治”将会再次复活，党内混乱导致的政局不稳容易为在野党创造机会，日本政治有可能重新回到“战国时代”；此外，日本社会正呈现出几个显著变化：从“一亿总中流”向“格差社会”转变，从消费社会向“低欲望社会”转变，从有缘社会向无缘社会转变，从安心安全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变。

关于新政府未来的政策走向，与会者认为，首先在对外经济政策方面，菅政权将在推动中日韩的 FTA 和 RCEP 东亚区域合作的同时，在“去中国化”上延续安倍的“中国+1”做法；在外交方面，菅政权将会坚持安倍的战略外交理念，同时表现自己的特色，对华关系慎而又慎，整体来看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菅义伟上台后日本的自主防卫能力会进一步提升，预计将强化防卫的自主性，在新兴防卫领域大力地投入和发展。因此，需要在台湾、钓鱼岛、南海、

中导等问题上密切关注其动向。

王新生

2020年9月29日

“博雅德信工作坊”第36工作间

后安倍时代：回顾与展望

2020年5月31日

近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突然辞职，作为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内阁总理大臣，此举将会为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安全等带来怎样的影响？随着自民党新总裁菅义伟被指名为日本第99任首相，并组建新内阁，进入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又将发生哪些新变化，中日关系今后的走向如何，这些都引发世人的密切关注。本期工作坊邀请到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就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经济外交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姜跃春的发言题目是《当前中日经济关系新变化及其影响》，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内容展开：第一，对安倍经济学及其未来的发展进行评价；第二，分析当前中日经贸关系出现的新变化；第三，探讨“中国+1”战略的升级版；第四，对未来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进行展望。

姜跃春认为，安倍经济学是恢复日本经济、实现战后最长景气的重要支柱。事实上，安倍经济学并不是一种经济学说。经济学说必须要有理论框架、理论支撑和具体的政策主张，而安倍经济学仅仅是一种为了恢复经济景气的对策。其理论根源主要是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别源于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和货币宽松政策。安倍经济学的新内容仅仅是其产业政策，目的在于解决日本的通货

紧缩问题。总而言之，积极财政、货币宽松和创新产业政策就是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从积极层面看，安倍经济学在目前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最明显的效果就是日本股市的大涨。安倍经济学出台之后，日本股市指数上涨了三倍，达到两万多点的水平。毫无疑问，这种政策效果对日本社会来说，具有振奋人心的作用。此外，安倍晋三上台后，日元汇率降低了 20%到 30%左右，这对日本的出口企业而言是重要的利好消息。然而，目前日本最为紧迫的问题仍旧是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随之而来的通货紧缩问题才是导致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关键。因此安倍经济学的目的是应对通货紧缩问题，实行积极的产业创新政策，希望改变日本传统的产业发展方式。

然而，安倍经济学并非完美无缺，它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比如日本国民获得感不足、收入分配不均衡，以及政策倾向大企业而中小企业获益较少。因此，许多日本人对安倍经济学感到不满。另外，很多人认为安倍经济学并没有解决日本经济的根本问题，即结构性改革问题。实际上，推行结构性改革并非一蹴而就，除小泉纯一郎的改革外，其他的改革举措都无果而终、收效甚微。姜跃春认为，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政治改革，而目前来看推行相关改革是相当困难的。总而言之，安倍经济学既有成功之处也有失败之处。未来，菅义伟将继承安倍晋三的经济政策，为了应对疫情也将采取宏观的调控政策。与此同时，菅义伟必然会有所突破，在民生问题上弥补安倍经济学的不足。另外，在对外经济政策中，新政府将在日美同盟的基轴下加强东亚区域

合作，但也有可能继续实行安倍晋三“中国+1”的“去中国化”政策。

姜跃春强调，中日经贸关系的最新动向是日本的“去中国化”政策。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之下，日本可能会跟进美国的行动，在经贸领域与中国脱钩。日本“去中国化”的进程始于“非典”之后的2004年，这一时期“中国+1”战略已经出台。当时日本企业认为，单纯依靠中国市场会给日本经济带来风险，因此许多企业酝酿离开中国，寻找中国之外的新投资地，这就是“中国+1”战略的雏形。2012年中日钓鱼岛争端发生后，中日关系跌入历史谷底，“中国+1”战略也基本形成，在2013年和2014年很多日本企业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国家，这就是“中国+1”战略的1.0版本。今年新冠疫情暴发后，日本政府于4月7日通过108万亿日元紧急经济对策，是20年来规模最大的经济刺激政策，这一政策明确提出将投入2345亿日元用于“改革供应链”，推动日本企业回归本土，并实现生产线的多元化。这是“中国+1”战略的2.0版本。与企业主导的1.0版本不同，2.0版本主要由政府主导。

从多边层面看，日本最近希望构筑日印澳新产业供应链联盟，目的是加强三国在印太地区的合作，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抗衡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菅义伟上台之后第一个外访电话打给了澳大利亚而非中国和美国，一定程度上说明他将继续推动这一政策。从地区层面看，日本主导的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仍在扩大，未来泰国、英国、菲律宾等国都或将加入CPTPP，但日本政府对中国的申请

加入的表态却表现消极。由此看，日本在双边、多边和地区层面都在加快“去中国化”的进程。

姜跃春认为，在“去中国化”的问题上日本和美国行动的性质有所不同。美国的“去中国化”行动是全面脱钩，而日本的行动则是产业布局的调整，更多是出于对本国经济安全的考虑。另一方面，美国对华战略的改变始于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的出台，从长期看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将十分恶劣。而日本的行动则是对“中国+1”战略的升级，较之过去更加充实，更具指导性，但只是一时的、轻微的、局部的调整，对中日经贸关系影响十分有限。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日本在华企业总数为33050家，2019年新增日本企业1000家左右。而目前第一批撤离的日本企业仅有90家，获批70家，主要是医疗健康相关产业。而在新能源汽车领域，部分日本企业甚至计划将研究中心迁往中国。由此来看，“中国+1”政策的影响目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并且由于日本对华处于出超地位，日本企业仍然依赖中国市场，因此日本企业很难轻易离开中国。此外，日本设想的多边产业链仍然处于“画饼”阶段，受制于工业结构和互补性的问题，新产业链短期内难以形成，而中日生产部门间的关系已经难以分离，因此“中国+1”战略对中国的影响十分有限。

最后，姜跃春对菅义伟上台后的中日关系进行展望。他认为中日两国的经济反差十分明显，日本正处于经济发展的下行道路。从2019年第四季度开始，到今年第二季度其经济增长处于战后最糟糕状态，而中国经济则在全球新冠疫情暴发的大背景下一枝独秀，因此菅义伟将在中日经贸关系上

花费更多精力。另外，由于“中国+1”战略的发展取决于中美博弈，中日关系的未来的发展不甚乐观。然而，从区域层面看，中日两国仍存在巨大的合作机遇，中国参与 CPTPP 将为地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的发言题目是《后安倍时期的日本外交变数及其走向》，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安倍外交对新内阁的影响，二是菅义伟上台后的外交行动，三是中日关系未来的发展。

吕耀东指出，首先安倍晋三的部分外交路线肯定会在菅义伟内阁中得到延续。外交理念上菅义伟将继续坚持安倍政府奉行的积极的和平主义方针。这一方针是安倍晋三基于日本战败国的国家定位提出的。与此同时，他提出的战后外交总决算政策也将被菅义伟内阁继承，换言之，菅义伟内阁将继续致力于处理与中国、俄罗斯、朝鲜等国的关系，解决历史问题。这其中包括日俄领土问题、签订和平条约的问题，日朝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以及中日历史问题。尽管在历史问题上日本政府更加强调面向未来，但是其主要目的在于将自身的历史修正主义渗透进外交政策之中，在此基础上对战后历史总决算并希望其他国家认可其历史决算。可想而知，这一行动将处处碰壁，只治标不治本。俄罗斯强调只有在日本正视历史的基础上才会考虑推进领土问题的谈判；日韩关系则从历史问题演化为双边的经贸、安全和政治问题；中日关系则因历史和领土问题不断出现起伏。

其次，菅义伟也明确表达了自身的外交理念，即在日本周边安全环境日趋严峻的背景下，以有效的日美同盟为核心

推进政策。同时，为了保护国家利益而战略性地推动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希望与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周边国家建立稳定的关系，为实现战后外交总决算、全力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的问题而努力。总体来看，这种外交理念的前提是继承安倍外交政策，解决安倍政府时期的遗留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强调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强化政治同盟，推进印太战略。吕耀东认为，作为冷战产物的日美同盟对朝鲜半岛和中国的指向性越发明显。而日美同盟则是日本历届政府不可动摇的外交基石，因此毫无疑问未来日美同盟关系将会继续发展。此外，菅义伟强调新冠疫情时期境外合作的重要性，并希望特朗普在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上给予其协助，这进一步反映了菅义伟对日美同盟重要性的认识。

更重要的是，日本希望通过日美同盟发展与美国其他盟友的关系，尤其是希望与英国、澳大利亚等国构筑一种总同盟关系。显而易见，这是针对中国的总同盟关系。在中国拥有对美基地攻击能力的情况下，日本谋求修改宪法，并改变日美同盟机制的非对等性。由于日本的整体安全政策是建立在日美同盟，即美国保护日本安全的基础上，因此在中国对美军基地具有攻击能力后，日本需要修改宪法，进一步解禁集体自卫权，获得先发制人打击的能力。而一旦如此，日本战后《和平宪法》就将名存实亡。这对日本而言，恰恰意味着日美同盟非对等性的改变，这也是日本一贯的追求，即借助美国实现自身的外交目的，最终实现日美对等。吕耀东认为，菅义伟时期这一政策将实现突破，比如宙斯盾系统的部署将对东亚地区整体的安全格局造成影响，值得国际社会关

注。总而言之，处理日美同盟关系仍然是菅义伟内阁外交政策的重点，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菅义伟内阁必然会谋求某种突破，这种突破不会落实在口号性质的、积极的和平主义方面，而是将通过安保政策的更新或修宪的形式加以实现，其最终目的是改变日美关系的不对等性。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希望在印太地区构建日澳和日英同盟关系。事实上，日澳两国政府之间希望建立“特殊的战略伙伴关系”，强调在新冠疫情之后构建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在整个国际层面加强合作。日英关系不仅局限于安全层面的合作，还包括区域经济的合作。英国加入日本主导的CPTPP以及日英贸易协定的达成对日本外交具有重要意义。在印太战略方面，日英双方就航行自由问题一拍即合，既符合日本的战略需求，也为英国重温帝国旧梦创造了条件。总而言之，日本实际上是希望在日美同盟框架之外，形成一个以自我为主导、以战后政治总决算为目的的总同盟关系，从而在安全层面和政治层面实现进一步的合作，这值得中国关注。

最后，吕耀东认为菅义伟上台后的中日关系仍将延续安倍晋三时期的路线，即化竞争为协调的对华政策。作为安倍内阁的“大内总管”，菅义伟对安倍内阁提出的对华缓和政策是十分清楚的。安倍晋三上台之初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其目的在于为修宪造势。修宪是自民党的立党理念和安倍晋三的政治理想，但修宪需要得到国会半数以上议员的表决支持，并得到半数以上国民的投票支持，才能最终实现。但由于安倍晋三的修宪主张在日本国内受到强烈反对，因此有必

要渲染中国威胁论，迫使日本国民认可修宪的必要性。然而，从民调数据上看这一企图并未得逞。近年来，日本政府逐渐认识到渲染中国威胁论已经影响到中日关系的发展，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日两国合作的空间巨大，同时中国威胁论也不足以使日本国民支持修宪。缓和中日关系迫在眉睫，化竞争为协调的政策得以推出。

吕耀东指出，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国在中美博弈中采取何种态度值得关注。此外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也将给中日关系带来不可预料的风险，日本新内阁仍然必须直面中日关系的四个基本问题，即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和东海问题，现在还需要面对涉港问题。尽管日本提出要在中美之间实行“平衡外交”，但菅义伟是否具备这种能力还有待商榷。总体来看，菅义伟在对华问题上仍是求稳为主，兼顾党内“知华派”尤其是二阶俊博的意见。在后安倍时代，菅义伟一方面要坚持安倍晋三的外交理念，另一方面还要表现出自身特色，这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但整体上看中日关系未来仍然是稳中有变。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新凤的发言题目是《后安倍时代的日本防卫政策》，发言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第一，菅义伟上台后日本防卫政策是否会出现变动；第二，今后日本防卫政策中自主防卫能力是否会有所提升；第三，日美同盟的未来走向。

江新凤认为，菅义伟将继承并延续安倍晋三政府时期的防卫政策，而安倍政权末期其防卫政策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安倍晋三 2012 年第二次上台执政后，中日关系受钓鱼岛事

件的影响跌入历史谷底，安倍晋三也采取对华强硬的外交政策，但从 2014 年开始中日关系逐渐回归正轨。在两国关系改善的大背景下，中日防务交流也取得了一些进展。2019 年 4 月，在中国海军成立 70 周年之际，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了“凉月”号驱逐舰参加中国海军阅舰仪式，并派遣海上自卫队参谋长率队参加研讨会，与中国海军进行积极的实务交流。2019 年 10 月，中国派遣海军“太原”舰参加日本海上自卫队国际阅舰式，并在归国途中打出横幅向日本台风受灾民众表示慰问，这些举动对于加深两国军民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总体来看，到 2019 年中日防务关系取得了极大改善，疫情期间中日两国相互帮助，中日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但在疫情后期，日本政府对华态度发生变化，在中美战略博弈和涉港问题上表现激进，对华态度强硬。日方在关键问题上出现了一些风向性调整，这为菅义伟上台后的对华政策埋下了伏笔，而菅义伟也将基本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发展中日关系。

在这一背景下，日本未来的防卫政策值得进一步观察。长期以来，日本在其《防卫白皮书》中宣称日本基本的防卫政策是在和平宪法下，实行专守防卫；坚持日美安保体制；确保文官统治；遵守非核三原则。但是今年日本政府宣称要修改防卫计划，这一举动值得关注。近几年日本政府一直在研究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问题，但这一提议遭到联合政权的另一方公明党的反对，因此一直没有在防卫大纲中得到体现。然而，今年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由于日本政府决定取消部署陆基“宙斯盾”，作为替代方案，拥有对敌攻击能力这一计划被提上日程，只是为了表达上的缓和，避免刺激中国，

对敌攻击能力这一表述被替换为“在敌方领域内组织弹道导弹的能力”。但无论表述方式如何变化，其实质都是谋求一种先发打击能力，这与日本目前防卫政策要求的专守防卫相抵触，换言之，这种政策变换意味着日本防卫政策的改变和突破。

尽管安倍晋三声称将在宪法范围内、在专守防卫原则的指导下讨论对敌攻击能力的问题，但如果严格遵守专守防卫的基本定义，这一声明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专守防卫的基本含义包括不拥有对别国构成危险的战略性进攻武器，包括核武器、轰炸机和航母等，这一规定源自日本宪法第九条。但事实上，目前日本已经在不断突破这一限制。除此之外，专守防卫的第二条定义是不对敌方实施先发制人的攻击，只有在受到武力侵略的时候才能进行有限的武力自卫，即被动防卫。第三条定义是防卫作战要限定在日本境内，即日本的领空、领海和周围海域。由此来看，拥有对敌攻击能力意味着对专守防卫原则的完全背离，是对以专守防卫为原则的防卫政策的根本突破。无独有偶，近几年来日本政府不断突破自身的防卫政策，包括解禁集体自卫权、出台《新安保法案》、改变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修改防卫计划大纲。更值得关注的是导弹拦截方式是否会发生变化，即由防御性的拦截转变为打击基地的进攻性拦截，这意味着日本防卫政策向主动方向发展，这种改变势必会引起中国及日本周边国家的警惕，对地区安全稳定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

江新凤认为，菅义伟上台后日本防卫政策中的自主防卫能力会进一步提升。日本防卫战略的基本目标是保卫日本领

土和日本国民的安全，创造有利于日本国家安全的环境，包括地区安全环境和国际安全环境，在此基础上对国际社会做出自身贡献。实现这一防卫战略的主要手段包括：第一，依靠日本自身的综合国力和防卫力量；第二，依靠日美同盟；第三，依靠多边合作，包括地区合作和国际合作，通过日美澳印以及东盟，在南海和北印太地区建立一个以民主价值观念为基础的多边军事政治联盟。上述日本防卫战略的基本目标和主要手段在菅义伟执政后不会发生改变，并且日本自主防卫能力和防卫力量也将进一步加强。目前日本的防卫费每年以 1% 的幅度增加，部队编制和作战体制也都进行了调整，比如加强水陆机动团两栖作战部队的力量，为夺岛作战做准备。另外，日本政府还加强了航空部队的力量，提出多域联合防卫力量的构想，发展新型军事技术，在新兴作战领域投入大量力量。总体而言，日本今后的防卫政策将以日美同盟为基础，依靠日美同盟发展自我保卫国土的力量，从而达到脱离美国也能独立防卫的目标。

江新凤认为，菅义伟上台后日美同盟将继续强化，主要原因是日本自身力量还比较弱小，羽翼尚未丰满，因此安倍晋三才会不断强调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是一个不朽的体制。菅义伟上台后与特朗普通话，也再次确认日美同盟是地区稳定的基础。由此来看，新政府上台后日本对日美同盟的判断和表述都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然而，日本在依靠美国的同时，也在不断寻求与美国的对等性。2015 年日本和美国发布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同盟从此向周边地区扩展，日美同盟不仅保卫日本，还成为了全球性的同盟，涉及军事、

外交等方面。未来，日美两国在太空战、网络战、电磁武器等新兴领域的合作也会进一步加强。不过，日美同盟对日本而言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日美同盟本身矛盾很多，其中包括基地费的问题，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后要求日本更多地付出以减轻美国的负担。除此之外，日本对美国保卫日本安全的决心存在怀疑，对日美同盟能否最终发挥作用还心存疑虑。

与此同时，中日关系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达成的平衡状态面临挑战，中国对钓鱼岛海域进行常态化巡航，日本则在政策表态上毫不退让，这影响了中日两国的民间交往。近期钓鱼岛问题发生了一些新变化，日本石垣市计划在钓鱼岛上进行设施建设；日美两国计划在钓鱼岛周边海域进行联合军演；日本前防卫大臣公开表示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的安全威胁。上述一系列新动向都是对中国的挑衅，给中日关系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总体而言，菅义伟上台后仍然需要保持中日关系的稳定，尤其是在经贸领域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但是中国也必须对日本的行动保持警惕，在安全领域日本可能继续在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上挑衅中国，在防卫政策上可能延续安倍晋三的使命推动修宪的进程。尽管如此，双方也应该认识到，中日关系的稳定符合两国的利益。为了维护这种稳定，一方面要防范突发事件，时刻做好准备；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大局出发，重视中日关系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新生的发言题目是《安倍长期执政的政治性因素及其遗产》，内容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安

倍晋三长期执政的背景及过程；二是安倍晋三长期执政的原因；三是安倍晋三长期执政留下的政治遗产。

1993年自民党第一次由执政党沦为在野党，由其他八个党派联合执政，但八党派联合政权缺乏稳固性，执政一年后自民党重新上台。自民党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但到2009年自民党再次选举失败，众议院席位大减，彻底沦为在野党。之后日本政坛经历了三届民主党政权，但最终民主党政权以失败告终，选民对民主党彻底失望。2012年9月，安倍晋三再次当选自民党总裁后率领自民党获得选举胜利，此后六战六胜，执政长达八年时间，自民党占据众议院半数议席，与公明党组成的联合政权在众议院中占据绝对多数议席。然而，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成绩欠佳，未能获得半数以上议席，但由于自民党与公明党联合政权的存在，仍然掌控了参议院半数以上议席。由此来看，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自民党在日本政坛中再次独领风骚，取得了巨大进步。

对于安倍晋三能够长期执政，王新生认为，首先是因为日本政坛中在野党溃不成军。2012年年底选举中民主党出现分裂，小池百合子的“希望之党”选举失败，最终在野党多党化趋势明显，难以对抗自民党。其次是安倍晋三在自民党内缺乏竞争对手。党内长期以来的陪跑者石破茂在民众中缺乏足够的威望，也没有领导自民党、整合党内派阀的能力，因此无法挑战安倍晋三在党内的地位。第三，安倍晋三控制了日本政府的官僚集团和日本舆论。2014年安倍晋三通过内阁人事调整的机会，掌控了600多名课长以上的政府官僚，而这些官僚正是日本国家日常行政的管理者，因此安倍晋三

对政府事务具有很强的控制能力。除此之外，安倍晋三对新闻媒体采取拉拢打击的策略，压制敌对媒体，支持亲近媒体。运用《有组织犯罪处罚法》和共谋罪打击媒体的报道业务，还在 NHK 中安插亲信，最终达到掩盖丑闻、操纵社会舆论的目的。第四，安倍晋三获得了年轻选民的支持。调查显示，20 至 39 岁年龄段的人生活满意度最高，对安倍晋三的支持率也最高。相较于物质生活水平，这些年轻人更倾向于追求生活的自由，反对其他人干预自己的生活，对物质生活没有太多期望，因此表面上看生活态度消极。这也是日本当前“反知性主义”思想大行其道的原因，即不讲逻辑、不顾过程只关注结果，这恰恰与安倍晋三的执政风格十分吻合，因此安倍晋三得到了许多年轻人的青睐。

最后，王新生总结了安倍晋三的政治遗产。他认为，安倍晋三最大的政治遗产是建立了首相主导决策过程的政治决策模式。此前，日本实行的是官僚主导的政治决策模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政治家普遍缺乏行政管理的基本常识和经验，因此只能依靠官僚。但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自民党执政已经超过 20 年，自民党政治家的政治经验和知识日益丰富，因此开始干预决策过程。20 世纪 90 年代，小泉纯一郎推行政治改革，建立内阁府，实行首相官邸主导决策的决策模式。这一制度变迁的背景是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日本政治改革和行政改革的进行。1993 年政治改革使党总裁掌握了选举候选人的推选权利，因此兼任自民党总裁的日本首相对自民党和内阁成员的控制力进一步增强，这为首相权力在政治领域的扩展创造了条件。2001 年日本政府开始

行政改革，设立新的行政机构，将政府架构从一府二十二个省厅减少到一府十二个省厅，省厅的合并、分化和重组削弱了官僚权力。内阁官邸掌握预算编制权，从而进一步加强了首相对官僚的控制力。最终结果是通过行政机构的重组，削弱了省厅官僚的权力，加强了首相官邸的权力，并且首相官邸彻底掌握了日本的财政权力。由此，在小泉纯一郎时期实现了首相官邸主导决策的决策模式。安倍晋三第一次执政时期，通过增加首相助理，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掌握了安全与外交权力。此外，安倍晋三还掌握了重要官员的任命权。而在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时期，除了设立国家安全保障局和内阁人事局之外，他还恢复了一系列的咨询机构，并利用这些机构架空自民党自身的决策机制。这导致了执政党事权审查功能的丧失，党内民主形同虚设，引发自民党内部的批评。比如小泉进次郎批评安倍晋三内阁提出的三千亿日元儿童日托计划，认为这一决策完全没有征求自民党的内部意见。

王新生认为，这种首相管理体制是安倍晋三长期执政留下的最大政治遗产，也是后安倍时代最大的政治麻烦。因为安倍晋三作为强势领导人设计的政治制度并不一定适合所有人，尤其不适合其接班人。此外日本政治历史上也有一种规律，即长期政权之后的政权大多比较“短命”，比如吉田茂、佐藤荣作、小泉纯一郎之后的政权。事实上，安倍晋三的成功既有其自身的因素，也要归功于以内阁人事局为代表的辅佐者们。这说明日本整体制度的运行并不仅仅是首相自身所能驾驭的，缺乏执行者的配合首相依旧会一事无成，这就是民主党政权失败的教训。民主党政权时期因为官僚的消

极抵抗和不配合，政治决策难以贯彻，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

王新生指出，菅义伟的政治生命预计将会受到挑战，因为他在自民党中无派系归属，缺乏立足的根基，也很难整合自民党党内的各个派系，最终会导致政局不稳。与此同时，在野党也在加快统一的步伐，对于重新执政跃跃欲试。其中立宪民主党获得了联合工会的支持，领导人的社会表现尚可，其前景不可小觑。总之，安倍晋三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是因为他建立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政治制度，找到了符合其强势领导人特点的执政方式。但目前来看，自民党内缺乏驾驭这一套制度的强势领导人，这给日本政局的走势埋下了伏笔，未来的发展仍旧充满各种不确定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胡澎的发言题目是《后安倍时代的日本社会走向》，她主要谈了三个问题：第一，当前日本的社会特征以及日本由平成到令和三十年间的社会变化；第二，新冠疫情对日本社会的影响；第三，后安倍时代日本社会的走向。

首先，胡澎分析了日本社会变化的主要脉络和当前的危机。后安倍时代日本的发展方向与日本的社会和国家治理水平以及选择的道路有关。目前日本社会最大的危机是少子老龄化，即出生人口在逐年降低，总人口在不断下降，老年人口不断增多，老龄化严重。有预测称，到 2065 年日本人口将降低至八千万，届时日本将面临劳动力匮乏的问题。与此同时，尽管日本拥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护理保险制度，但是普通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仍十分突出。对普通工薪阶层的老年人来说，入住养老机构意味着高额的花销和金钱

负担，而贫困老年人则完全承担不起养老费用。因此，少子老龄化这一现象对日本社会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具体来看，人口出生率与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密切相关，所谓总和生育率是指 15 岁到 49 岁女性生育孩子的平均数量。历史上日本在 1947 年和 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过两次“婴儿潮”，达到了两次人口高峰。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的人口逐渐下降，总和生育率也在不断下降，今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仅仅是 1.36，远远低于安倍经济学所设定的 1.8 的目标。安倍经济学射出的“三支箭”，目标之一就是提升总和生育率，由此也采取了许多措施，包括提供免费的托儿所和保育院，向 39 岁以下结婚的新婚夫妇提供奖励。但是这些措施都没有奏效。这与目前日本年轻人的婚姻态度有关，除了晚婚晚育，许多年轻人选择不婚不育。数据显示，日本的终生未婚率在不断上升，其中 2019 年男性的终生未婚率为 23.4%，女性为 14.1%，这也是当前日本社会面临的很大问题。

2025 年对日本社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年份，因此在日本被经常炒作。战后出生的“团块世代”到 2025 年将进入老龄阶段，会引发很多问题，比如高龄老人领取大量养老金，给政府财政带来巨大压力。此外，医疗和护理开支也将不断膨胀，护理人才面临不足，给日本社会带来极大压力。老龄化社会的直接结果就是社会缺乏活力，年轻人涌入大城市，地方经济凋零，社会缺乏发展的动力。

平成时代以来日本社会出现了一些显著变化。第一，日本社会从“一亿总中流”转变为“格差社会”。20 世纪 80 年代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八、九成的日本人认为自己处于中

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水平相差无几，婚姻模式和家庭模式也并无二致，即以工薪阶层的男性为核心，包含家庭主妇和两个孩子的婚姻家庭模式。这些家庭生活两室一厅为主的团地住宅中，收入和教育水平大致相同，有钱人和极度贫困者都是少数。但在泡沫经济破裂后，尤其是 2008 年金融危机后，日本社会呈现出“格差社会”的特征，即贫富差距不断拉大。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就是终身雇佣制被非正规雇佣取代，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大量雇佣非正规雇佣员工，这些员工收入低、工作不稳定、缺乏上升机会，因此很难组建家庭。与此同时，“格差社会”中大城市和地方、城市和农村的差距也在拉大，导致人口向城市集中。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学术界加大了对格差社会的研究力度，《贫困大国》《女性的贫困》《下流社会》《朝向底层的竞争》等书籍出版，学者认为日本社会面临的不是“绝对贫困”问题，而是“相对贫困”的问题。第二，日本社会从“消费社会”向“低欲望社会”转变。现在日本年轻人的消费欲望很低，更倾向于将金钱投入到自己的爱好而非日常消费中，满足于自身的“小确幸”。受此影响，日本的高档商品乏人问津，优衣库等中低端品牌商品大行其道，日本人的消费观念发生了极大改变。第三，日本社会从“有缘社会”向“无缘社会”转变。过去日本社会的地缘、血缘和学缘关系不再发挥作用，出现了与社会脱节的“蛰居族”。他们靠啃老维持生计，没有工作和人际交往，给社会留下了很大的问题。第四，日本社会从“安心安全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变。除了自然灾害带来的风险，日本人最大的不安全感来自对养老的担忧。日本家庭与

中国不同，日本老人很难得到子女的赡养，这加重了日本人对人生和社会的担忧。针对这些问题，日本政府近几年出台了许多政策，目的是抚慰人民的不安心理，但收效甚微。

新冠疫情也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一些变化。从数据上看，日本的防疫工作成效显著，通过自律方式对社会加以限制，社会秩序保持了基本稳定，这与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危机管理体制密切相关。新冠疫情带给日本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工作方式的变革上，通过在线工作和远程工作的方式，日本人的工作文化得以改变。疫情期间在线教育的使用情况显示出日本在教育领域的通讯技术还比较落后，因此日本计划到 2023 年之前在小学和中学中实现电脑、无线网络的普及和覆盖。新冠疫情对低收入群体影响更为巨大，单亲家庭、打工的大学生和自由职业者等群体，在疫情期间受企业裁员或者关闭的影响，他们很难获得收入来源。而服务行业的个体经营者在新冠疫情中损失惨重，很多人负债累累。新冠疫情不仅对经济造成了影响，还有可能加剧日本社会的少子化趋势。疫情期间，日本“新冠离婚”现象频发，一些人对新冠患者的歧视十分严重，这加快了日本走向“无缘社会”的进程。

胡澎认为，日本的少子高龄化趋势仍将进一步延续。2019 年日本新出生人口为 86.5 万人，比上一年减少了 5.3 万人，这是此项调查进行以来的最低数字，而总和生育率只有 1.36%也证明日本政府的相关对策是失败的。目前日本女性仍然面临着家庭和事业的两难选择，这给日本女性带来了巨大压力，也进一步加速了少子化的进程。

劳动力短缺的现象仍将困扰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开放外来劳工和外来移民进入日本对日本社会十分重要，但其中牵涉许多问题，包括国民待遇、子女就学、社会福利分配等等。尽管现在新的生活工作方式可能会为地方发展带来机遇，刺激年轻人回到地方就业，或者在郊区定居组建家庭，但地方是否有能力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和工作环境，地方经济能否因此得到振兴仍不确定。疫情对日本经济发展是机遇还是挑战难以预测，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或将进一步拉大。

除此之外，日本社会的问题解决机制也可能会发生变化。多元协作的工作模式会进一步得到探索，这种工作模式意味着不是以政府为主角，而是政府、非盈利组织、企业和志愿者处于平等地位，共同解决日本的社会问题。这需要日本多个参与者平等合作、多元协助，为解决高龄少子化的共同目标而努力。

在 5 位专家学者发言结束后，与会人员围绕上述发言内容就美日同盟的未来走向、中日经济合作的前景、东亚格局的变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